

改革的“风景”和“盆景”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在过去 40 年,我们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回顾这 40 年,我们有很多的改革自下而上、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从“盆景”最后演变成“风景”,成为独有的“中国经验”,形成了靓丽的“中国风景”。

那么,如何理解当下改革中“风景”和“盆景”的关系,我觉得要厘清三个层次的关系。

首先,改革需要培育“盆景”,更要营造“风景”,努力让盆景成优美风景,力促盆景与风景齐头并进。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能取得伟大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弘扬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持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上接 13 版）

新总规,描述到了 2035 年的北京“水乡”蓝图：

——构建由水体、滨水绿化廊道、滨水空间共同组成的蓝网系统。通过改善流域生态环境,恢复历史水系,提高滨水空间品质,将蓝网建设成为服务市民生活,展现城市历史与现代魅力的亮丽风景线。到 2020 年中心城区景观水系岸线长度由现状约 180 公里增加到约 300 公里,到 2035 年增加到约 500 公里。

——在城市副中心,顺应现状水系脉络,科学梳理、修复、利用流域水脉网络,建立区域外围分洪体系,形成上蓄、中疏、下排多级滞洪缓冲系统,涵养城市水源,将北运河、潮白河、温榆河等水系打造成景观带,亲水开敞空间 15 分钟步行可达。

——协调水与城市的关系,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思路,保障首都水资源高效利用,提高水安全保障能力。

——规划保留并新增外调水通道,完善相关水源配套工程,构建四条外部水源通道、两条输水水源线、七处战略保障水源点,多级调蓄联动共保的首都供水安全保障格局。

——加强河湖水系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提高水系连通性,恢复河道生态功能,构建流域相济、多线连通、多层循环、生态健康的水网体系。加强河湖蓝线管理,保护自然水域、湿地、坑塘等蓝色空间。

——加强本地水源恢复与保护。严格保护两库一渠,涵养地下水。到 2020 年密云水库蓄水量明显增加,到 2035 年力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有序实施官厅水库、永定河流域生态修复,到 2035 年恢复官厅水库饮用水水源功能。

——增加地表水调蓄能力,优先利用外调水,提高再生水利用比例,压采和保护本地地下水,加大地下水回灌量,逐步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

一系列具体措施和目标,让人们到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未来,不禁充满憧憬和希望。

■征稿启事

本报评论版长期征集读者来信。我们期待收到来自不同地方的中国故事,倾听来自不同行业群体的声音,尤其欢迎来自基层的生动细节,反映时代进步的细微变化。

来稿请注明“草野·字下”,请勿使用附件。投稿邮箱: xhmrdx@163.com

今年春节,山西省永和县奇奇里村第一书记郭若桥过得很开心。他高兴不仅因为年幼的女儿长大了一岁,还因为奇奇里村这个原来“鸟不拉屎”的贫困村大变样,脱了贫。

中央强调,扶贫要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脱贫攻坚的格局。郭若桥对此深有感触: 贫困村是个“穷小子”,扶贫干部要当个好“红娘”,一方面要把扶贫政策用好,让“穷小子”富起来,更要主动牵线搭桥,把外面的“好姑娘”介绍到村里来。

“红娘”并不好当,尤其是给“穷小子”说媳妇。刚到奇奇里村时,郭若桥发现,几百口人全靠房前屋后的枣树过日子。村子偏远,路难走,有了好收成也运不出山,卖不出好价钱。

为脱贫头疼几个月后,郭若桥偶然发现有摄影师来村子附近的黄河美景乾坤湾拍照。当时他也没有想到,这个村里人司空见惯的黄河滩,能够蜕变成撬动全村脱贫的支点。

郭若桥经常与摄影家们交流脱贫的想法。那时,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悦和郭若桥商量出“认领枣树”的点子——中国摄影家协会发动会员自愿在村里以每棵枣树 120 元的价钱认领,无论丰歉都认账。很快,1000 棵枣树就全部被认领了。120 元,是摄影家扶贫的一份心意,贫困户则多了一份稳定收入,村民们再也不用担心风吹雨打,红枣烂地里了。

郭若桥又想依托乾坤湾的知名度发展旅游。随后不久,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全国第一个“摄影家影像村”落户村里。现在,这已经成为村里发展旅游的重要资源之一。

此前,郭若桥就想着把新时代的元素引进闭塞的小山村。路修好后,他把目光投向了一家知名共享单车公司,很快联系了这家公司的山西分公司,对方很吃惊,因为农村根本不是目标市场,更何况贫困村。

“扶贫是全国的大事,你们不想出份力?”“奇奇里村很快就出名了,你们投放到这里,能提升公司形象。”对方还是摇头,被拒绝不要紧,接下来的半年里,郭若桥时不时给去个电话,发个短信,“汇报”一下村子日新月异的变化。

“影像村”打出了全国名气,让郭若桥更有底气。果然,“影像村”落户后仅几十天,共享单车就“骑”进了奇奇里村。现在,双方在山西省扶贫办的指导下,正合力打造全省首个共享单车旅游扶贫示范区。

当然,“红娘”不能只介绍“好姑娘”,更要提醒“穷小子”怎么“拾掇家”。在当地市、县、乡政府支持下,郭若桥一边组织修建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办起“农家乐”;另一方面,苦口婆心地指导引导加劝导,逐步改变村民观念,让村民从“吃饱就行”到“想致富”。几年来,“穷小子”变身“小鲜肉”,贫困村成了“世外桃源”。

在脱贫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不少贫困村都面临着此前奇奇里一样的情况: 穷、偏、没资源,别说发展,就连脱贫都得靠政府兜着,否则看不到希望。

真的没希望吗?恐怕不见得。希望在贫困群众的观念转变上,更在扶贫干部的观念转变上。扶贫干部不能只是把各项惠民政策落实到位,更要主动当“红娘”。

对扶贫干部来说,当“红娘”必然比“讲政策”难,要千辛万苦找到有志于脱贫的社会力量,更要巧妙地找到双方的“共同语言”,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让贫穷的山村融进时代的潮流。换个角度看,这种突破,又何尝不是扶贫干部为自己的能力、见识“脱贫”呢?

正如一些家长所说,为中小学生减负,对促进中小学生更加全面、快乐地成长善莫大焉,但负担真要减下去,必须有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制度安排,尤需重视农村家庭的现实情况和农村中小学生的教育需要,不能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印发的相关文件,为中小学生减负明确了重点,也说明减负需要有系统化措施,在具体执行层面,基层需力戒为求立竿见影而凭感觉、拍脑袋。

公众对部分地区教育部门减少学生在校时长、压缩课业负担等单一化减负措施并不看好,这种顾虑的背后折射出他们的担忧: 对城市孩子而言,这种单一减负措施减出来的时间,很可能会被收费不菲的课外辅导班占据; 在农村,留守老人监护下的孩子则可能在这种减负中逐渐与城市孩子在学业上拉开差距。

想要避免单一化减负的副作用,需要家、校、社会协调有序、合力推进。例如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通过学校与社区合作义务开展“四点半课堂”的形式,引导中小学生在放学后在社区做作业或培养其他业余爱好,把孩子空闲的时间从看电视、玩手机中“解放”出来,有效缓解家长后顾之忧。

当地教育部门还把参加“四点半课堂”等义务辅导作为教师评先评优、职称晋升的加分因素。“四点半课堂”开展以来,家长放心、社区安心、教师用心,三方积极性在良性互动中得以充分调动。

确保减负举措取得实效,严肃问责是必要的。为确保工作得实效,各地可以尝试将减负效果纳入对相关部门的考核、评优之中,通过奖优惩劣,进一步激发相关部门的工作积极性。从具体举措来看,不妨两方面入手:

其一,从整治课外培训机构开始,相关部门通过对披上“隐身衣”、藏匿于民宅的小型课外培训班、培优班等进行有效治理,确保“减负令”的落实执行不打折扣。

其二,从规范民办学校入手。有家长反映,他的孩子在一所民办外语实验初中读书,老师专门建了微信群要求家长把作业拍照上传,语数外等几门课下来,孩子从 6 点多回家,吃半个小时饭后,一直写作业到午夜 12 点,早晨 6 点多还要起床上学,学生长期睡眠不足,影响身心健康。

有家长担心孩子健康,向学校反映“课负不合理”,但学校回答: 我们民办学校的生存法则只是只管升学率。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坚信,通过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主动作为,因地制宜出台系列措施,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中小学生在“负重前行”的难题一定得到有效缓解。

乡村
振兴
应
补
齐
文
化
短
板

“三农”问题始终是党中央关注的重大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被写进了十九大报告,还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乡村振兴问题,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做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强调: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也指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因,有历史方面的原因,有人才方面的原因,更有文化方面的原因。

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以文化人”。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措施,也恰恰是目前农村建设中存在的软肋和短板。

笔者常回农村老家,也在县里当了 7 年县委常委,和农村、农民有着较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对农村和农民文化生活的现状有着真切的了解。在我接触到的农民中,很多家庭找不到一本书、看不到一张报。上级帮建的“农村书屋”,不仅数量有限,真正去阅读的人也寥寥无几。

白天忙挣钱、晚上打麻将,是很多农民生活的常态。所谓的文化活动,无非是看看电视、跳跳广场舞。甚至连老祖宗留下的优秀农耕文化、淳朴民风也在慢慢遗失。相反地,赌博、酗酒、天价彩礼、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倒大行其道。文化落后,无疑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亟须补上的短板。

然而,在有些人的观念中,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生态良好,文化建设只是项“软指标”,是“务虚”的工程。有这种想法,说白了还是错误的“政绩观”在作怪,是目光短浅、作风漂浮的现实表现。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内涵是环环相扣、紧密联系的,任何一项不可或缺,必须整体推进,全面提升。没有强大的文化作基础,乡村文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先进文化的引领,农民将永远是落后的农民,农村将永远是落后的农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指示,立足乡村文明,深入挖掘、继承发扬农耕文化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同时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

贫困可以帮扶,政策可以倾斜,技术可以提供,人才可以引进,这些都能够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见功见效,但文化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补齐短板,需要久久为功。

让我们的孩子
不再负重前行

本报记者何晨阳

说起给中小学生减负的文件,各地都出台过不少,可无奈的现实是,不少地方“课业负担年年减、学生作业日增多”,中小学生在课外负担沉重,减负措施落实不到位,不仅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还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这一顽疾遭家长和师生诟病已久。

从推迟到校时间到规定课外作业量不超 1.5 小时,不少地方近年都出台了为学生减负的新举措。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明确提到“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这些凸显了政府治理减负问题的决心,让家长和学生们充满期待。

正如一些家长所说,为中小学生减负,对促进中小学生更加全面、快乐地成长善莫大焉,但负担真要减下去,必须有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制度安排,尤需重视农村家庭的现实情况和农村中小学生的教育需要,不能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印发的相关文件,为中小学生减负明确了重点,也说明减负需要有系统化措施,在具体执行层面,基层需力戒为求立竿见影而凭感觉、拍脑袋。

公众对部分地区教育部门减少学生在校时长、压缩课业负担等单一化减负措施并不看好,这种顾虑的背后折射出他们的担忧: 对城市孩子而言,这种单一减负措施减出来的时间,很可能会被收费不菲的课外辅导班占据; 在农村,留守老人监护下的孩子则可能在这种减负中逐渐与城市孩子在学业上拉开差距。

想要避免单一化减负的副作用,需要家、校、社会协调有序、合力推进。例如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通过学校与社区合作义务开展“四点半课堂”的形式,引导中小学生在放学后在社区做作业或培养其他业余爱好,把孩子空闲的时间从看电视、玩手机中“解放”出来,有效缓解家长后顾之忧。

当地教育部门还把参加“四点半课堂”等义务辅导作为教师评先评优、职称晋升的加分因素。“四点半课堂”开展以来,家长放心、社区安心、教师用心,三方积极性在良性互动中得以充分调动。

确保减负举措取得实效,严肃问责是必要的。为确保工作得实效,各地可以尝试将减负效果纳入对相关部门的考核、评优之中,通过奖优惩劣,进一步激发相关部门的工作积极性。从具体举措来看,不妨两方面入手:

其一,从整治课外培训机构开始,相关部门通过对披上“隐身衣”、藏匿于民宅的小型课外培训班、培优班等进行有效治理,确保“减负令”的落实执行不打折扣。

其二,从规范民办学校入手。有家长反映,他的孩子在一所民办外语实验初中读书,老师专门建了微信群要求家长把作业拍照上传,语数外等几门课下来,孩子从 6 点多回家,吃半个小时饭后,一直写作业到午夜 12 点,早晨 6 点多还要起床上学,学生长期睡眠不足,影响身心健康。

有家长担心孩子健康,向学校反映“课负不合理”,但学校回答: 我们民办学校的生存法则只是只管升学率。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坚信,通过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主动作为,因地制宜出台系列措施,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中小学生在“负重前行”的难题一定能够有效缓解。

本报记者裴立华

回顾这 40 年,我们有很多的改革自下而上、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从“盆景”最后演变成“风景”,成为独有的“中国经验”,形成了靓丽的“中国风景”。

改革经验,最终使得许多改革“盆景”变成了“风景”。

像小岗生产队的“包产到户”到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期的乡镇企业到后期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从局部出发,最后上升到全局层面,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最后“强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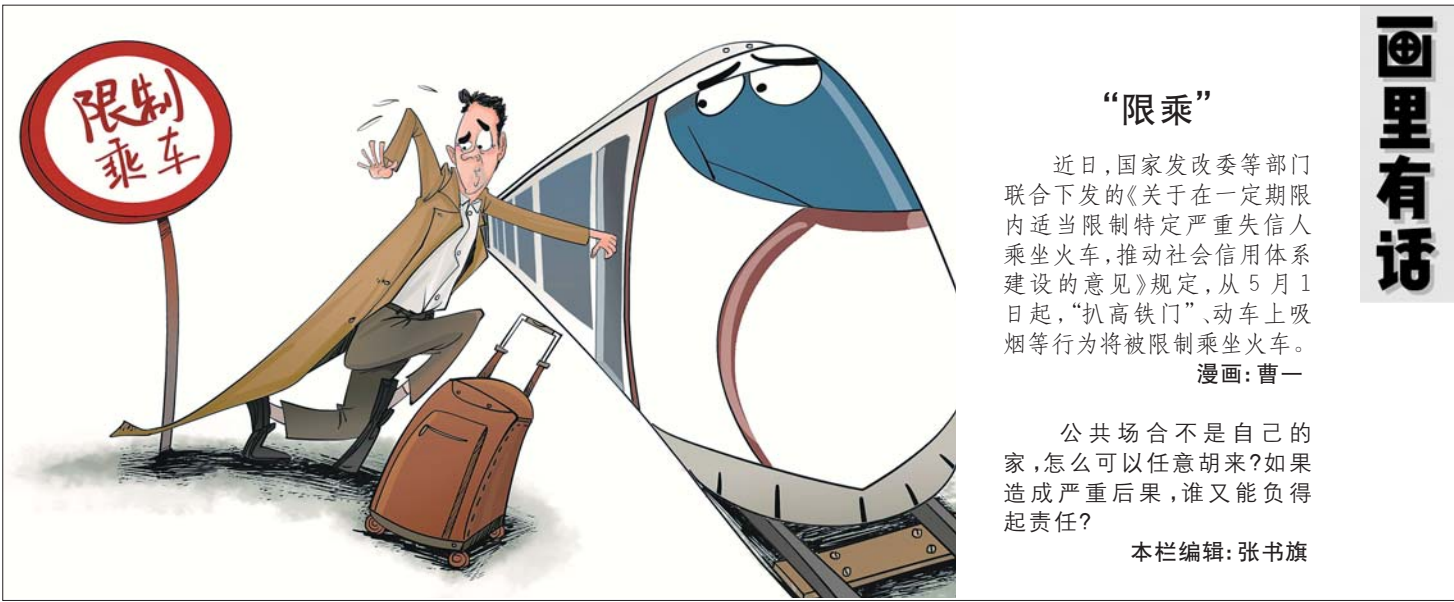
其次,有些改革虽然成不了“风景”,也不要简单否定“盆景”,符合实际需要的“盆景”多了,也能“满园春色”。

过去,确实有些经验在一些地方风生水起,但在更大范围推广后却失败了。出现这种

“改革经验出不了县”的现象,可能是这种改革不符合其他地方的实际,或者这种改革在一段时间内有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符合时代需要。

现实来看,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这种局部有效的“盆景”,因为改革原本就需要有探索精神。尤其在当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我们的主要矛盾,地区之间差异很大,省情、县情各不相同。同时,中国的许多领域进入“无人区”,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简单地借鉴或者复制,改革需要不断试错,需要建立容错机制。

因此,成不了“风景”的“改革”,如能成为符



“限乘”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规定,从 5 月 1 日起,“扒高铁门”、动车上吸烟等行为将被限制乘坐火车。

漫画: 曹一

公共场合不是自己的家,怎么可以任意胡来? 如果造成严重后果,谁又能负得起责任?

本栏编辑: 张书旗

多
一
些
“
红
娘
式
”
扶
贫
干
部

本报记者王井怀、霍瑶

今年春节,山西省永和县奇奇里村第一书记郭若桥过得很开心。他高兴不仅因为年幼的女儿长大了一岁,还因为奇奇里村这个原来“鸟不拉屎”的贫困村大变样,脱了贫。

中央强调,扶贫要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脱贫攻坚的格局。郭若桥对此深有感触: 贫困村是个“穷小子”,扶贫干部要当个好“红娘”,一方面要把扶贫政策用好,让“穷小子”富起来,更要主动牵线搭桥,把外面的“好姑娘”介绍到村里来。

“红娘”并不好当,尤其是给“穷小子”说媳妇。刚到奇奇里村时,郭若桥发现,几百口人全靠房前屋后的枣树过日子。村子偏远,路难走,有了好收成也运不出山,卖不出好价钱。

为脱贫头疼几个月后,郭若桥偶然发现有摄影师来村子附近的黄河美景乾坤湾拍照。当时他也没有想到,这个村里人司空见惯的黄河滩,能够蜕变成撬动全村脱贫的支点。

郭若桥经常与摄影家们交流脱贫的想法。那时,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悦和郭若桥商量出“认领枣树”的点子——中国摄影家协会发动会员自愿在村里以每棵枣树 120 元的价钱认领,无论丰歉都认账。很快,1000 棵枣树就全部被认领了。120 元,是摄影家扶贫的一份心意,贫困户则多了一份稳定收入,村民们再也不用担心风吹雨打,红枣烂地里了。

郭若桥又想依托乾坤湾的知名度发展旅游。随后不久,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全国第一个“摄影家影像村”落户村里。现在,这已经成为村里发展旅游的重要资源之一。

此前,郭若桥就想着把新时代的元素引进闭塞的小山村。路修好后,他把目光投向了一家知名共享单车公司,很快联系了这家公司的山西分公司,对方很吃惊,因为农村根本不是目标市场,更何况贫困村。

“扶贫是全国的大事,你们不想出份力?”“奇奇里村很快就出名了,你们投放到这里,能提升公司形象。”对方还是摇头,被拒绝不要紧,接下来的半年里,郭若桥时不时给去个电话,发个短信,“汇报”一下村子日新月异的变化。

“影像村”打出了全国名气,让郭若桥更有底气。果然,“影像村”落户后仅几十天,共享单车就“骑”进了奇奇里村。现在,双方在山西省扶贫办的指导下,正合力打造全省首个共享单车旅游扶贫示范区。

当然,“红娘”不能只介绍“好姑娘”,更要提醒“穷小子”怎么“拾掇家”。在当地市、县、乡政府支持下,郭若桥一边组织修建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办起“农家乐”;另一方面,苦口婆心地指导引导加劝导,逐步改变村民观念,让村民从“吃饱就行”到“想致富”。几年来,“穷小子”变身“小鲜肉”,贫困村成了“世外桃源”。

在脱贫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不少贫困村都面临着此前奇奇里一样的情况: 穷、偏、没资源,别说发展,就连脱贫都得靠政府兜着,否则看不到希望。

真的没希望吗?恐怕不见得。希望在贫困群众的观念转变上,更在扶贫干部的观念转变上。扶贫干部不能只是把各项惠民政策落实到位,更要主动当“红娘”。

对扶贫干部来说,当“红娘”必然比“讲政策”难,要千辛万苦找到有志于脱贫的社会力量,更要巧妙地找到双方的“共同语言”,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让贫穷的山村融进时代的潮流。换个角度看,这种突破,又何尝不是扶贫干部为自己的能力、见识“脱贫”呢?

正如一些家长所说,为中小学生减负,对促进中小学生更加全面、快乐地成长善莫大焉,但负担真要减下去,必须有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制度安排,尤需重视农村家庭的现实情况和农村中小学生的教育需要,不能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印发的相关文件,为中小学生减负明确了重点,也说明减负需要有系统化措施,在具体执行层面,基层需力戒为求立竿见影而凭感觉、拍脑袋。

公众对部分地区教育部门减少学生在校时长、压缩课业负担等单一化减负措施并不看好,这种顾虑的背后折射出他们的担忧: 对城市孩子而言,这种单一减负措施减出来的时间,很可能会被收费不菲的课外辅导班占据; 在农村,留守老人监护下的孩子则可能在这种减负中逐渐与城市孩子在学业上拉开差距。

想要避免单一化减负的副作用,需要家、校、社会协调有序、合力推进。例如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通过学校与社区合作义务开展“四点半课堂”的形式,引导中小学生在放学后在社区做作业或培养其他业余爱好,把孩子空闲的时间从看电视、玩手机中“解放”出来,有效缓解家长后顾之忧。

当地教育部门还把参加“四点半课堂”等义务辅导作为教师评先评优、职称晋升的加分因素。“四点半课堂”开展以来,家长放心、社区安心、教师用心,三方积极性在良性互动中得以充分调动。

确保减负举措取得实效,严肃问责是必要的。为确保工作得实效,各地可以尝试将减负效果纳入对相关部门的考核、评优之中,通过奖优惩劣,进一步激发相关部门的工作积极性。从具体举措来看,不妨两方面入手:

其一,从整治课外培训机构开始,相关部门通过对披上“隐身衣”、藏匿于民宅的小型课外培训班、培优班等进行有效治理,确保“减负令”的落实执行不打折扣。

其二,从规范民办学校入手。有家长反映,他的孩子在一所民办外语实验初中读书,老师专门建了微信群要求家长把作业拍照上传,语数外等几门课下来,孩子从 6 点多回家,吃半个小时饭后,一直写作业到午夜 12 点,早晨 6 点多还要起床上学,学生长期睡眠不足,影响身心健康。

有家长担心孩子健康,向学校反映“课负不合理”,但学校回答: 我们民办学校的生存法则只是只管升学率。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坚信,通过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主动作为,因地制宜出台系列措施,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中小学生在“负重前行”的难题一定能够有效缓解。

有条件的地方,还应该考虑对“临界贫困”以及欠发达地区的“普惠”政策的推动,从帮扶贫困户转向解决好“临界贫困”人群及地区的帮扶问题,这也应是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一道“必答题”。

倘若对“临界贫困”现象置之不理,容易诱发较多矛盾及问题。例如,在一些地方,贫困村的交通、环境等有了明显改善,各类产业扶持政策纷纷落实,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村容村貌大幅改善,贫困户的脱贫速度较快,生产生活条件变化明显; 而一些原本条件相对较好的非贫困村和“临界”贫困村,由于较少受到政策支持,反倒出现“临界贫困”村组的发展不如贫困村的“相对贫困”问题。

与此同时,对于分布在非贫困村和“临界”贫困户的大量贫困人口而言,由于只是对贫困人口进行扶持,缺少对于村组的整体政策倾斜,村组的整体发展速度较慢,容易导致贫困人口与“临界贫困”人口之间出现矛盾,使得部分“临界贫困”人口心理失衡,甚至诱发“争当贫困户”现象。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基层调研时,一位干部讲起一个现象: 一个村组中有两户邻居,

到的关注与支持相对较少。

“临界贫困”现象,在不少地方客观存在,并在诸多调研中得以印证。

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直属巴中支部委员会一项调查的公开信息显示: 按照贫困标准,如秦巴连片贫困核心区域巴中 80% 以上的非贫困村临近贫困, 60% 以上的农村人口临近贫困。“仅针对贫困村、贫困人口的重点帮扶,容易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不利于区域整体脱贫。”

部分媒体的公开报道也显示,“贫困村吃撑了,非贫困村却饿得不得了”问题正在出现。不少非贫困村的道路、水利、照明、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明显不如贫困村,甚至一些县两个贫困村都修了路,偏偏中间夹着的非贫困村被绕过去了。“人、财、物都往贫困村集中,非贫困村一定程度上受重视程度不够,从而造成新的发展不平衡。”